

徐跃权 杨沛超 徐兆英 孔庆杰

论我国现代目录学研究中的科学观念问题

摘要 以科学发展史为依据,提出完整的发展的科学观念。据此对现代目录学研究中科学观念的表现及其是非得失进行了剖析,重新认识了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和性质,探讨了当代目录学发展战略和实现途径。参考文献 14。

关键词 科学观念 目录学 发展战略

分类号 G257

ABSTRACT Based o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authors propose complete and developed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analyze their applications in the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in China, reevaluate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in ancient times, and propose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14 refs.

KEY WORD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Development strategy.

CLASS NUMBER G257

世纪之交,中国目录学也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国目录学的学科建设,大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在目录学现有框架上解决自身的各种实际问题,使之沿其固有的轨迹向前推进。二是从其他学科借鉴、引进有益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来丰富自己。三是倾听时代的呼声,在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实践中研究真问题,做出真学问,并从中获取发展动

力。此外,把目录学的发展自觉纳入当代科学发展的洪流之中也十分重要。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曾说过:“趋势就像是奔腾的马,顺着它们奔跑的方向来驾驭就比较容易”。当今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中国目录学在着力进行学科建设的同时,也应关注科学在当代的新特点、新动向,顺应科学发展的潮流。科学观念就是这

元^[12]。美国由电脑安全专家组成的电脑安全研究所调查指出,高科技犯罪使美国企业和其它机构1996年蒙受1亿美元的损失。该研究所1997年调查显示,金融欺诈造成2490万美元的损失,电信舞弊损失达2270万美元,专利资料窃取损失达2100万美元,网络和数据遭破坏损失达430万美元,电脑病毒入侵则造成1250万美元的损失^[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97@TQ001)的研究论文之一。

参考文献

- 1 邱均平. 信息资源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7(2)
- 2 匡文波. 论网络文化. 图书馆. 1999(2)
- 3 刘钢. “中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文化背景”研讨会纪要. 哲学动态. 1997(6)

- 4,5 乔岗. 网络化生存.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 6 关世杰. 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7 李展. 因特网上的跨文化传播. 新华文摘,1999(5)
- 8,11,12 胡泳,范海燕. 网络为王.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 9 Ferdinand Schoeman e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Privacy: An Anth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0 [英]巴雷特著,郝海洋译. 数字化犯罪.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3 陆群等. 网络中国:网络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 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8

付立宏 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教师。通讯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2。

邱均平 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伟军 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教师。

(来稿时间:1999-12-07)

其中的重中之重。

1 科学的历史轨迹

正像人人都有其世界观一样,凡是接触过科学的人也会形成自己的科学观。对于科学工作者而言,科学观念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时刻左右着他的科研活动。由于个人的认识能力及接触科学范围和深度的局限,其科学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和感性的色彩,因而有时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获得关于科学的理性认识最便捷的途径是查阅工具书。有些著作把科学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用逻辑的概念等抽象形式反映世界。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上述定义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人对科学的普遍认识,但仍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它既没有反映出古代科学的特征,也没有反映出当代科学的新特点。

文献[1]认为:科学和文化一样,是个难以界定的名词。由于科学本身在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给科学下一个永世不变的定义难以做到。科学按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依次表述为:科学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一项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相关活动的事业。

显然,科学在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曾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科学的性质、形态、特点和社会功能都有很大的不同。

古代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初级阶段的产物,主要是描述性的,或是对经验的概括,总的说来没有达到真正的理论形态。它们广泛分布于史书、杂记等多种古代文体中。

近代意义上自然科学是从 15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17 世纪以后迅速发展,从对自然现象分门别类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严密理论形态的独立学科。“20 世纪以来,科学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形成了由许多领域构成的庞大的学科系统。”^[2]

二战以后,科学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与生产力空前紧密结合。这时的科学被称为“大科学”,成为一项国家事业,一种社会建制。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科学技术是重要生产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为了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决胜残酷的国际竞争,自 80 年代起又大兴国家创新体系。政府、科研

院所和企业直接参与科学事业,形成三者相互结合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列入第四产业——科学产业。作为科学产业先锋的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事实上已经将科学研究的目从“增进知识”转向“创造财富”。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加速了科学从“计划科学”向“市场科学”转变的进程。

因此我们认为,完整的科学观应该是一个关于科学的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正确运用它应做到因时因地制宜。

2 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历程

现代科学原本起源于西方,属于“舶来品”。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这位远道而来的“赛先生”在中国扎下了根,并被赋予“科学救国”的神圣使命。在当时,中国的一切学术几乎都要接受科学的洗礼和改造。

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其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构成了传统学术的主要内容。经史子集是传统的学术分类的代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被历代遵循为治学模式。为了与势头强劲的西学抗衡,近代也曾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最终也无济于事。大约经过半个世纪的摩擦与碰撞,以史学知识为主要内容,以历史叙事为主要话语形态的中国传统学术,便让位于以科学叙述和逻辑分析为特点,有着一整套严格学术分科制度的西方现代科学^[3]。随着这种学术制度在我国现代教育与科学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旧时所谓的“目录之学”也同其他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学术一道被纳入了这一新体系之中,并获得了新的名称:“目录学”或“目录科学”。此后的目录学研究开始尝试着用现代科学的语汇和形式来发展这门学问。

从本世纪初至解放前,是我国目录学界效仿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模式来总结传统目录学、开创现代目录学的时期。出现了如《目录学发微》、《目录学概论》(刘纪泽著)这样的以现代方式阐述古代目录学的名著。姚名达的《目录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具有现代目录学开创之功的著作。他创立了理论、历史、方法这一目录学知识框架,为此后的目录学建设提供了一个较为实用的模式。他还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将目录学与当时新兴的重要的社会文献机构——图书馆联系在一起。其领悟时代精神的能力实可称道。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马列主义哲学、苏联目录学模式,特别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学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科学观念在目录学领域的表现与剖析

中国目录学按照时间断限可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几个部分。由于近代目录学属于新旧目录学转型交替时期,当代目录学是现代目录学的继续发展,因而中国目录学实际上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大部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是创造知识和整理、修改知识,以及开拓知识新用途的工作。文献[4]指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目录学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古代目录学研究说到底,仍停留在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自在’阶段,并没有上升到‘自为’阶段。”20世纪以来……这时的目录学研究已逐渐摆脱以往那种不自觉的自在状态,开始注重学科自身的认识,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本文将重点分析科学观念在我国现代目录学研究中的各种表现。由于科学观念非常抽象,学者治学时往往又不加说明,因而我们的分析主要建立在透视其对目录学的基本看法上。

继承与发展历来是我国目录学建设的两大主题。科学观念的不同必然带来对这两个主题的不同认识和做法。

3.1 继承中的观念混淆问题

中国目录学本是一门非常有传统的学术。抛弃了目录学的丰富遗产,中国现代目录学必然成为无源之水。然而继承的前提是对古代学术遗产的科学认识;简单的拿来主义或全盘否定都无法完成继承的大任,甚至会给现代目录学的进步留下隐患。这方面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许多研究者总是潜移默化地用现代人对现代科学的一般性认识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古代目录学。

3.1.1 以今框古现象

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是现代人总结古代目录学成就方面少有的力作。他对目录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久而心知其意,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至其所以然之故,大抵默喻诸己,未尝举以示人。”^[5]他首先肯定了目录之学和目录之书的存,同时否定了治目录学之书(可以理解为目录学著作)的存在。最后他断言,本应写在治目录学之书的知识只存在于古人的心中。所谓“发微”者,即代为古人言也。

除去郑章两部大作不提,我们仍不禁要问,我国古代目录学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今人看重的东

西古人只把它记在心里,而古人殚思竭虑所写的目录之书偏又不合现代人的口味?关于古代目录学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所掌握的历史文献来看,古人根本没做过什么对我们能有所帮助的界定。科学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已经终结了的古代学术,按照历史文化遗产来处理,将古人在这一领域所留下的一切学术成果都作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抛开定义的困扰,把矛盾归结到什么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容上来。概括起来,其内容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为数众多的古代目录,另一类是以郑章两部著作为代表的为数很少的编目工作经验总结。这两者之中,前一类无论从性质、数量还是作用上,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容主体。

上述结论虽然简单,却非常重要。它不仅符合科学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的性质和形态,而且对于破解长期存在于目录学界的一切因司空见惯而见怪不怪的矛盾提供了认识上的帮助。

3.1.2 概念混用现象

《古典目录学》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事业、目录工作、目录著作和目录学研究状况便成为古典目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6]。实际上,只要承认古代目录学已经终结,就等于承认古代目录学的知识产权应归属古人。现代研究者对它所能做的只能是整理、研究和批判地继承,这类成果当归属现代科研范畴。诸如“未来十年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任务”^[7]这样的提法恐怕就是对古人的古代目录学和今人的古代目录学研究在观念上没有明确区分的缘故。

刘纪泽在《目录学概论》中用“目录的体例”来阐述目录学的体例,用“目录的派别”来阐述目录学的派别,用“目录的功用”来阐述目录学的功用^[8]。若按现代科学的观点,他肯定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但考虑到该书的内容,在“目录学乃目录之学”的特定历史阶段,这种写法应该是允许的。

朱天俊先生曾评论过,包括《目录学发微》、《古代目录学浅说》(来新夏)、《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罗孟祯)等30年代至今的大量目录学著作,其实多数“都是以讲述古代目录学发展为主的中国目录学史。”^[9]这些书的作者多为学科知名专家,为什么还会出现意在叩开目录学的大门而最终却进了目录学史房间的怪事呢?

3.1.3 生搬硬套现象

纵观各门科学,从语文、数学、经济到医学、政治、军事,个个事关国计民生。偏偏目录学喜欢套用其在

古代的功用,甚至上升到了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科学研究指南的高度。语言不重要?但不必人人学语言学。医学不重要?治病有医生。要求人人学目录学,其专业性又何在?清人王鸣盛关于目录之学作用的高论其实远不及张之洞来得实在:“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3.1.4 分析与结论

我们可以拿与之亲缘关系最近的传统史学做一类比。简而言之,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展过程的。如果《目录学发微》等书是真正意义上的目录学史著作,那么它的内容必然不同于古代目录学的内容。根据目录学与史学同根同源的特点,古代目录学只可能是研究我国历史的某一侧面。

向歆父子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以“大博学家”的才学与气魄为古代目录学树立了被后世称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理想(这与司马迁《史记》为传统史学开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标如出一辙),而且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从“图书整理”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去实现宏伟目标的道路——带有提要 and 类序的分类目录体例。

古人治目录学,真正见功夫的地方在于对受编文献内容的学术史梳理上。目录及编目方法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方式和手段。这与司马迁为记述历史而创出纪传体十分相似。因此更确切地说,就知识而言,古代目录学的内容有三部分:由提要、类序构成的学术概况,由著录项目构成的文献概况,以及由郑章两部著作构成的编目思想与方法总结。郑章两部著作虽然重要,却无法代替学术史、文献史;就如同刘知几和郑章的史论再重要也无法代替《史记》、《二十四史》等史籍一样。

由此引申,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这个命题的基点,正是植根于目录之书内容的学术史、文献史的知识性和目录形式的技术性、工具性上。抛开了目录,古代目录学就近乎乌有。靠郑章两部著作,断然不能实现古代目录学的各种功用。同样,现代目录学著作由于摆脱了书目的形式和内容,再谈旧时的功用已是不合时宜。

当目录学进入现代科学后,学术史的内容与任务便分离出去了。目录学摆脱史学藩篱,它从古代目录学那里能直接继承的只剩下了作为形式与方法的外壳。认真研究一下当今具有代表性的《目录学》(彭斐章等编著)、《目录学教程》(杨沛超等编著)、《当代目

录学》(郑建明编著),不难发现,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从古代目录学那里继承并发展了的文献揭示、报道与整序的一系列方法,外加一个科学学式的开头和一个关于书目实践的现代组织管理的结尾。

人们在揭示、报道与整序文献时虽然希望方法越多越好,但这种方法的产生要受到文献特征与类型发展、人们对此认识能力以及实现的技术手段等三方面的制约。就方法的本性而言,却是越少越简单越好。只要这三方面的制约条件没有大的改变,目录学的核心内容就会相对稳定。目录学方法论的特性给人以目录学内容“贫困”的假象。

3.2 发展上的观念僵化问题

打开各种目录学教科书,目录学定义的属概念都是“科学”,从来未予解释。对科学的认识仍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然而,“那种把科学概念仍停留在本世纪初,认为只是反映事实和规律的普遍客观真理的知识体系的认识已经不够了”^[10]。我们认为:只有把当代科学观念与目录学实际相结合,走产学研相结合、以产业兴学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目录学致用之学的伟大复兴。

3.2.1 更新科学价值观,实现科研方向的转变

以往的目录学研究偏重于理论的完善与升华。虽然也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呼声,产学研分离的体制及书斋式的治学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观。目录学的社会科学特点虽然限制了它不能像一些自然科学门类那样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像高科技那样直接以“创造财富”为目标,但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服务社会、创造价值仍然是发展的方向。为此,行业主管部门应从国家建设大局和学科建设出发,制定出有明确导向的科研总体规划,使目录学的科研成果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保持合理的比例,在源头上把好科学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关。

3.2.2 加强行业意识,促进学科发展

当代科学与技术、学科与行业已高度融合。这与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从哲学角度认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维定式已有所不同。目录学学科与书目事业应该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没有行业的兴盛哪有学科的繁荣。“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现象在书目行业尤为严重。除图书情报机构,书目行业还包括出版发行机构和一些信息产业机构。长期以来书目行业管理松散,合作与自律不强。我们知道,管理的学问大可到国家学说、政党学说,小可到企业制度、公司管理。搞好行业的组织管理是一门大学问。我国书目

业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优势没有完全发挥,体制僵化、缺乏活力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行会、协会等行业管理体制为我所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事业级的大学问。

美国图书情报业成功的背后是行业的有效管理和实干家的努力。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主管本国图情事业发展与学科教育两方面。它成立100多年来,制定了大量的业务标准、规程及手册,有力地规范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在一般人看来,美国《工具书指南》不过是一本书目,没什么特别之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百科全书》却视之为“美国图书馆事业的一个里程碑”。自由职业者K. Kister所写的3本关于词典、百科全书和地图集购买的指南类书,虽是个人的著作,同样可以被ALA指定为各馆购买此类图书的必备参考工具。被姚明达视为中国目录学优良传统的提要在我们的目录中已很难见到,而《美国工具书年鉴》却是用得纯熟,读来几乎各个精彩。我国目录学界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过硬的成果,而是苦于找不到实现的途径和机制。这验证了一个道理:实干兴事业,大管理出大效益。

3.2.3 树立大科学观念,自觉加入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知识创新体系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技术创新是知识创新的目标和动力,同时也是知识创新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两者必须密切结合。知识创新的最终目的是经济发展,尤其是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来源。技术创新应当把知识创新的成果转化为企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和政府。企业是国家技术创新、技术开发投入的主体,企业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而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知识创新的主体。

因此,目录学的发展必须以为国家建设服务为目标,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上寻找突破口,积极参与到像CALIS项目、CNKI工程这样的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偏重文史的知识与人才结构本来是目录学界的优势,但与日新月异的信息产业相比则显得创新能力不够。目录学的许多理论和梦想如BC,UBC,科学引文索引等只有依靠新技术、新工程才能在我国尽快实现。如何与信息产业界及国内其他相关行业搞好协作与协调,是学科建设开放搞活的关键。

3.2.4 树立产业观念,增强学科实力

我们如果把近年来出版的目录学专著同时下流行的经济学、会计学、审计学甚至是法学的教科书摆在一起比较一番,难说目录学就一定比它们逊色。目录学者英雄气短,源于我们这个行业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高、实力不强。实力不仅决定形象、地位和社会利益分配,而且反过来又影响学科的再发展。目录学内容的方法论特性为其产业化提供了内在依据。兴办产业、服务社会是解放目录学这个第一生产力的现实道路。

几年前偶翻《大美百科全书》(EA的台湾中文版),在“威尔逊”(WILSON, Halsey William)条下看到这样一句话:“目录学是威尔逊公司开创的,威尔逊公司是美国的主要目录索引出版商”。虽然前半句没有忠实EA原文,启发却颇深。仔细想来,这个威尔逊公司的确身手不凡。美国不搞国家书目,该公司的营业书目CBI就担起了国家书目的重任。它出版的种类繁多的书目索引,遍布全美各馆。这位“美国目录学家兼出版商”似乎没什么理论大作传于后世,倒是他这家私营企业擎起了美国书目业半壁江山。此外,杜威的DDC、LC的MARC等无一不是有开创性的经世致用的大学问,是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完美结合。这恐怕也是中美目录学的一个重要差别吧。

目录学的学问说深也深,说浅也浅。任何个人不论学问多深,如果不能走出书斋,学会运用社会组织(学会、协会、企业等)的力量和运作规则实现自我、造福社会,其成果充其量也就是白纸黑字。目录学的致用和产业化便无从谈起。

此外,目录学成果的转化说到底是国家、行业、机构的事。个人研究成果的作用通常是供同行参考,要成为现实生产力,还必须先将之转化为行业法规、标准、技术规范或实用工具。关键还是机制和体制问题。纵观迅速崛起的信息产业,有美国的微软道路、中国的北大方正道路,中国目录学致用之学的伟大复兴注定要在产业化中实现。

4 几点启示

从昔日的“显学”到今天的图书馆学门下的一个普通分支,中国目录学的兴衰很值得研究总结。

在古代,目录学紧紧依附于传统史学,从中获得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中国各门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古代的目录学研究群体与旧史学的研究群体高度重合。其顶尖

人物如郑樵、章学诚更是同时称雄这两个领域。人才的重合必然导致学术价值观念的认同。我国古代以下这些特定的社会状况更突出了目录学的地位和作用:崇史尚文的社会风气,博文强记、述而不作的治学方式,教育的不发达,教科书类文献没有从一般文献中发育出来,文献稀少及其对绝大多数读书人的不可获得性。所有这些都使得目录之书对于一般人来说既是一部学术史又是一部文献史,自然弥足珍贵。

“现代科学认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一般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是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其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处延;二是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理论。”^[11]从观念上讲,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没有“遍地成学”自有其深刻的社会道理。而一个学科即使有了初步的理论也未必就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各学科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生存和地位问题。经济学是当今的显学,因为它事关国计民生。一个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会就可以把东南亚的金融闹得天翻地覆,不研究经济是要吃大亏的。军事科技备受各国重视,谁不在这上面下大功夫就会落后挨打。因此在学科以外,还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即社会的需要和投入。凡是受国家重视、被优先发展的学科,必然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学科的地位与其对社会的贡献和干预程度是成正比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早已不是 60 年代的样子,已经达到了言必以若干假设开篇、用数学运算说话、通篇充斥符号和公式的程度。尽管有人不以为然,但市场经济竞争的巨大动力仍在极大地推进经济学数学化的进程。谁早一天掌握先进理论和方法,谁就能在商海角逐中多一分胜算。目录学恰恰缺少这种诱惑和动力。恩格斯曾指出:如果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2]。

当务之急是更新观念、理顺体制,在产业和服务上下工夫,培育学科生存发展的土壤,为目录学复兴积蓄能量。学科建设不能没有理论,更不能只有理论。

1990 年陈光祚先生提出“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13],不仅大大拓宽了目录学的范围,而且提供了新的思考意境。中国古今目录学对文献流的“治理”,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思路和做法:一个重在总结过去,一个重在关注未来;而二者的分水岭是分类法自身的独立。完成这么宏大的学科

建设,我们在人才队伍、知识结构、技术力量上的准备尚不充分。信息界巨子比尔·盖茨曾盛赞:“图书馆员知晓组织起来的信息的价值。他们是熟练的知识组织者与导航员。”^[14]实际上,赋予图书馆员这种能力的知识最早起源于目录学。分类法的工具化打破了目录学的神秘。时至今日,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核心技术仍然是文献揭示、报道和整序方法,只不过是应用的环境、条件和手段有所不同。知识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浪潮已经为目录学的崛起和三者更高层次上的协作开辟了道路。历史积淀最深的目录学的复兴之路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10 宋健.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4
- 2 敦湛. 科学.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404
- 3 黄平,汪丁丁. 学术分科及其超越. 读书, 1998(7):106
- 4 彭斐章等. 论当代目录学的发展趋势. 图书情报知识, 1991(4):9~10
- 5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 成都:巴蜀书社, 1991
- 6 来新夏. 古典目录学. 北京:中华书局, 1991:14
- 7 彭卫国,陈琪. 未来十年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任务. 图书馆, 1991(6):7~10
- 8 刘纪泽. 目录学概论.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1979
- 9 朱天俊. 目录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2, 18(4):11~15
- 11 刘迅,纪晓萍. 目录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图书馆界, 1985(3):21
- 12 恩格斯.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 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05
- 13 陈光祚. 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 图书情报工作, 1990(1):1~7, 30
- 14 A Conversation with Bill Gates. Information Outlook, 1997(5):24

徐跃权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讲师。通讯地址:长春市。邮编 130024。

杨沛超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

徐兆英 吉林省粮高专图书馆馆员。通讯地址:长春市。邮编 130062。

孔庆杰 东北师大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信息部。通讯地址:长春市。邮编 130024。

(来稿时间:1999-12-07)